

威海文史资料

第四辑



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前 言

我会是于1987年威海市升为地级市后成立的。一年来，在中共威海市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在上级政协的指导下，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地开展了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对重要史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整理，沿用原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刊印的辑序，编印了《威海文史资料》第四辑，呈献给广大读者。

在征集、选编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各县（市）区政协的积极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开展工作时间不长，缺乏经验，再加上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谬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

目 录

我和文登乡师.....	于云亭 (1)
党在文登乡师领导的革命活动	毕庶生 曲相升 (24)
威海卫公立师范学校回顾	李继安 (35)
我所知道的文荣威联中.....	邢礼文 (46)
我的母校——凤鸣学校.....	韩 力 (54)
缅怀老校长鞠思敏.....	林治文 (66)
孙子玉传略.....	孙 竹 毕西田 (78)
段诚斋领导的农民抗粮斗争	段维新 段恂卿 (87)
忆张连珠同志.....	段佩兰口述 姜洪军整理 (95)
孤石河惨案亲历记.....	于天禄口述 荀其鳌整理 (106)

解放战争中的东海转运站

..... 吕景新 (113)

怀念徐敬之先生..... 杨大田口述
孙高鼎整理 (120)

解放前威海的绣花业..... 张瑞符 (141)

我在威海卫地方法院任职的经历
..... 李儒珽 (149)

国民政府威海卫办事处始末..... 孙英友 (159)

赤山法华院与日本赤山禅院..... 吴德永 (171)

收回威海卫后地名的整顿..... 李仁海 (179)

(附)

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191)

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194)

我和文登乡师

于云亭

1932年2月，我受山东省教育厅的委派，到文登筹建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下简称文登乡师），历时半年，于同年夏建成招生，我任校长。时年26岁。

我少年时代，目睹了地主豪绅的奢侈淫逸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心中气愤，但弄不清其中的道理。上中学以后，我才逐渐明白了这是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遂立志投身革命，救国救民。1924年秋，我在北平国民学院读书时，经倪今是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31年夏，我大学毕业，到东北特区安达站第四中学教书。“九·一八”

事变暴发后，我因在学生中秘密组织“反帝大同盟”，被当局驱逐离校。1932年2月，回到济南，经山东第一师范教师袁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认识了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派我到文登筹建第七乡师，就是他的主张。

一、筹建文登乡师

早在1930年，山东省教育厅就决定在文登由地方筹集资金兴建第七乡师，从牟平、荣成、文登三县招生（后扩大到蓬莱、栖霞、海阳、福山、招远、威海等县市）。正式筹建时，筹款事宜由文登县立初级中学王远丰校长和文登县督学孙子玉主持。原定所需款项由三县均摊，但反复磋商后，牟平仅出两千元，荣成出三千元，文登县因有王远丰的多方奔走，并得到孙子玉先生的大力支持，竟独出三万巨款。资金基本筹齐后，1932年2月，便在文登城东南杨

家瞳一片荒地上破土动工。这时，我已来到文登就任文登乡师筹备处主任。据说，原拟学校建成后，由王远丰任校长，但因王氏与国民党文登县党部书记长胡建民有矛盾，胡到济南省党部报告说，文登中学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猖獗，王身为校长，不闻不问，终日弄花玩鸟，不务正业，加之王是地方势力派，省教育厅也怕以后难以控制，故欲另行物色人选。适逢我回济南，便选中了我。我到文登后，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住在国民党文登县党部院里的文庙“乡师筹备处”。

学校的布局分为三部分。一是南部，称南院，建有两层34间教学楼一幢。楼北绕以群厢，厢北是平房三进，做教导处、图书馆和师生宿舍用。楼西侧，建学生盥洗室，室北右侧为学工厂房。二是北部，称北院，原为张宗昌部属毕蔗澄的别墅，设有教务办公室、总务处和

伙房、餐厅等。南北院之间为体育活动场地。总占地面积约三十五市亩。此外，在学校东面二里的山坡上，租了六亩薄田，做为学农基地。三是在学校附近设有两处附属小学：由文城东关黄泥庵小学改的乡师附属小学和由棋盘小学（即三里庙小学）改的乡师实验小学。二者都是学生的实习基地。

文登乡师是在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并仿照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晓庄师范布置的：在教学大楼的大门两旁，以陶行知的“和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作对联，上额题“到农村去”。在过堂的仪门上，画着东北三省地图，标明重要城市、铁路交通、矿产资源，顶端写有“还我河山”四个遒劲大字，两边写着“你看见吗”、“你记得吗”，以激发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餐厅的墙壁上写有“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诗名句。餐厅外面的墙壁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共产主义教育格言。

当时，我是本着德才兼备的原则来组织班子的。学校的领导是：校长于云亭，教务主任王少逸，训育主任刘春璞(不久改为孙平野)，总务主任是孙子玉。孙先生原为文登县教育局长，后因改革旧教育制度而遭到顽固势力排挤改任县督学。他与王远丰多方筹款建校，历尽了艰辛。乡师建成后，又毅然辞去督学职务，应聘就任总务主任，甚可称述。应聘的教员有李琴吾，他思想进步，有学识，入校前就是中共党员。还有陈之任(现任新疆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国语，他为人正直，学有所长，颇受学生欢迎。后又聘请了德高望重的文登中学的于寿卿先生来校兼任生物课。所聘请

的教师大都是有朝气、事业心强、文化知识和业务底子厚实的人。对不称职者，一经发现，便予以辞退。

1932年暑期，招收一级学生。因为乡师不收学费，每月还发给学生伙食费五元（当时四元即可），因此报考的人数达一千三百多名。从中择优录取了八十名，划为两个教学班。学生来自农村，感情纯朴，且能吃苦耐劳。开学时，校舍尚未竣工，暂在县立第一小学二部（在文城北官）上课。是年9月迁入新校舍。

二、建立党组织

我到文登后，及时与中共胶东党组织和文登、荣成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学校筹建时，就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汤成九（我的夫人）为组织委员，江先政（文登中学六级学生，要求来校教国语）任宣传委

员。在聘请教职员和招生时，我还通过文、荣两县党组织，有计划地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荣成县党组织送来刘家语（谷牧）、丛培壁（丛烈光）、邢礼文三位党员学生；文登县党组织送来了王本贤（国民党文登县党部青年干事，跨党）、张童华两名党员学生。

1932年8月，文登乡师正式开学时，共有党员11人。除以上5名学生党员外，教职员中的党员有：于云亭、汤成九、李琴吾、杨方千、王绍义和三里庙附小教师滕学秀。不久，酝酿成立党支部。在党员会议上，大家的意见是由我担任支部书记。我提出，我身为校长，目标容易暴露，不便活动，我不担任书记就可以校长的身份掩护大家的活动。因此我提议让刘家语担任支部书记。经酝酿，大家一致推选刘家语担任支部书记（刘时年17岁），丛培壁任组织委员，邢礼文任宣传委员。教职员中的

党员成立一个党小组，起骨干作用。

为了掩护刘家语的活动，我提出，刘家语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在刚建起的潮湿的集体学生宿舍里受不了，让总务主任孙子玉先生安排他在小楼的东屋里住下。好在当时的房子很多。

中共文登乡师党支部的成立，不仅在乡师，而且在文登，乃至在整个胶东东部地区，都是一件大事。她成为胶东东部地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摇篮，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培养了一批新人，一度成为中共胶东特委开展工作的基地之一。

三、壮大党的队伍

文登乡师党组织诞生的时候，革命正处于低潮。蒋介石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人和爱国群众。在我们党内，王明

“左”倾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各级党组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山东省委和胶东特委，自1932年到1935年间，由于叛徒告密，亦多次遭到破坏。所以，我们经常接不到上级的指示，偶尔接到指示或收到党中央办的《斗争》，其中也多是要求“开展武装暴动”之类的东西。学校党支部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不能盲目行动，应谨慎地开展党的活动。大家正视了困难，也分析了有利条件：文登乡师建立不久，且处边远地区，我们的活动尚未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学校的教职员大都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学生多来自农村，生活贫苦，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精神；校长又可以充分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和校长的合法地位，进行党的活动。大家一致认为，在文登乡师开展党的活动还是有条件的。基于这种分析，党支部决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开展活动：一是

扩大马列主义思想宣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开展建党工作；二是走出学校，以“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交朋友”为口号，开展党的农村工作，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三是通过军事训练，培养武装斗争干部；四是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当时，课程表上虽然写着“三民主义”课（后改为“党义”课），可教师讲的则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并结合讲解《资本论解说》、《新帝国主义论》、《唯物辩证法浅说》等。我们把“纪念周”课改为形势教育课，由校长亲自担任，主要讲解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罪行和抨击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还提倡学生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唯物辩证法》等著作。为满足师生

的需要，乡师党组织还千方百计地购进当时禁读的进步书刊，有的数量不足，就翻印一部分。从1933年开始，一年级学生人手一册《政治经济学》，二年级学生人手一册《社会科学概论》，每周上两节课。教师在上国语、历史课时，往往也公开宣传马列主义。这些宣传教育使师生的政治视野开阔了，大家谈论最热烈的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该怎样革命？总之，乡师的革命烈火开始燃烧了，“红七师”的名声也传开了。

这些情况，引起国民党文登县党部和县政府的注意，不时给学校寄来清单，开列一批又一批禁读的进步书刊，还派人来学校查看。有一次，县党部的人突然来到学校，先到二级的教室里搜查。一级学生急中生智，把书刊藏到盥洗室里，用毛巾盖起来，然后把地上放满了水。搜查者见满地是水，就绕过去了。

在开展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我们不断壮大党的队伍。我们从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入手，先成立了一个半公开的组织，叫“反帝大同盟”，接着又成立了“新科学研究会”、“新文艺研究会”、“史地研究会”、“互济会”等群众组织。我们利用这些组织，把广大师生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发展了王炳真（王一平）、刘德贤（刘其人）等一批新党员。到1933年秋，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已由五人发展到三十多人，占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

1933年春，我还写信给从北平回到家乡海阳县的中共地下党员于醒夫（于洲）来校任总务处庶务员，担任教职员党小组长，使党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四、扩大革命宣传教育

为了转变知识分子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

民的观念，使其逐渐和工农打成一片，共同救亡图存，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培养工农感情，提倡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要做法：

一是组织“农友会”。我们提出了“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群众交朋友”的口号，利用星期六下午课外学农的时间，让党员带领进步学生到附近农村开展工作。要求每个党员都交一两个贫苦农民朋友，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又在一些村庄成立了十几所简易小学和农民夜校，帮助农民识字学文化。教师由乡师学生轮流担任，两周轮换一次。经过一段时间，农民们纷纷涌到夜校里来，连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到夜校听课。他们没有纸笔，就端着一瓢沙，用草棍在沙上练习写字。农民和学生的感情逐渐加深了，逢年过节，还给学生送来一些鸡蛋、粽子等好吃的东西。